



《太平天国学刊》编委会编

太平天国学刊

第三辑

中 华 书 局

太平天国学刊

第三辑

《太平天国学刊》编委会编

中华书局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办

《太平天国学刊》编委会编

编委 于世明 王庆成 尹福庭 龙盛运

刘耀 邱远猷 贾熟村

主编 王庆成

顾问 罗尔纲

太平天国学刊

第三辑

《太平天国学刊》编委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6 5/8印张·3.95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362 定价: 3.20元

ISBN 7-101-00159-9 /K·68

目 录

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	李文海 (1)
乡官体制的理想和实际·····	宓汝成 (50)
试论太平天国天京的粮食问题·····	方之光 崔之清 (70)
太平军中的“刺面”问题·····	宫 明 (91)
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六种》序·····	罗尔纲 (104)
《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	
《钦定前遗诏圣书》跋·····	罗尔纲 (108)
《武略》跋·····	罗尔纲 (125)
从怀庆之战看太平军的战法·····	张一文 (129)
直隶团练的钳制与太平天国北伐	
的失败·····	李达三 方尔庄 (140)
太平军北伐日志·····	张守常 (152)
石达开远征军主力进军路线考误·····	史 式 (180)
关于石达开家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陈周棠 (192)
太平天国文献词语小札·····	吴良祚 (200)
天京西王府南王府考·····	聂伯纯 (239)
“天将曾示”述考·····	郭存孝 (252)
常熟县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物考释·····	廖志豪 黄步青 (258)
“佩天福左陆参军”木印释文正误·····	祁龙威 (263)
太平天国印书校勘记·····	吴良祚 罗文起 (266)

《清史稿·洪秀全传》一段文字的

校勘·····	张守常	(301)
湘军故乡湖南试探·····	龙盛运	(303)
对胡林翼及其集团的初步探索·····	贾熟村	(333)
江忠源的军事思想初探·····	石培华	(369)
试论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政策的		
转变及其原因·····	韩 明	(384)
清政府借师助剿政策之制定与推行·····	刘 耀	(401)
论“借师助剿”·····	于醒民	(418)
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	蔡少卿	(439)
清朝官员函牍选辑·····		(456)
1982年1月——1983年12月全国报刊发表的太平		
天国文章目录索引·····		(499)
后记·····		(522)

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

李文海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在一些地区先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区域。太平天国政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短则数月，长则几年甚至十余年。那末，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们（当然是各色各样包括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太平天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呢？这一场被某些封建统治者形容为“天崩地坼”的大风暴对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却似乎没有得到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们足够的注意。有一些论著接触到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但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领域，却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对这个问题的冷遇，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不满足之感。列宁说：“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①马克思甚至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②我们引用革命导师的这两段话，并不是企图表示只有这个问题才是头等重要和高于一切的，不过是想说明，对于那些看起来似乎细小甚至有点琐碎的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41页。

② 《马志尼和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450页。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态和习俗的研讨，不但不背悖于唯物史观，其实倒反而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要求。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象一面多棱镜一样，虽然片断、零散然而却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某些真实面貌。研究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社会风习，自然也会有助于对太平天国运动本质的了解。当时人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呤喇就曾经说过，他同他的“所有友人和熟人”最初正是根据“亲眼见到”的“太平天国的生活和风俗”来认识和判断这场革命的。^①一些外国侵略者在派人到天京去时，也反复强调要注意搜集“关于你们所通过地区的居民或占领者的职业、服饰、食物、家庭和社会习惯、教育和性格等情报。”^②而那些顽固坚持清朝封建统治立场的人，则把太平军占领后带来的风俗的变化看作是心腹大患，常熟的封建文人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就记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谓吾邑若复，粮额也要变，文体也要变，风俗也要变。”^③从这些出发于不同目的的议论中，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社会风习的重视。

社会风习所包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在一篇文章里自然不可能全都涉及。这里只是选择几个问题加以粗略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一、宗教活动；二、服饰装束；三、婚丧礼仪；四、过节度岁；五、天国诸禁。对这些问题，也只是白描式地勾画一个大体的轮廓，因之不敢妄称研究，只能名之曰“素描”。

一、宗教活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洪秀全，是通过宗教的门槛

①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88页。

② 《麦华陀等一八五四年六月访问天京文件辑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4页。

③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丛编简辑》），第四册，第459页。

走上封建统治秩序的叛逆之路的。在发动武装起义之前，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一个拜上帝会作为这个运动的组织核心。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信条，在太平军中始终是奉若神明的。那末，太平天国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政权统治下群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生活呢？

有一些记载，过高地估计了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统治区群众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呤喇说过：“在他们政权统治下的所有家庭全都用圣经代替了佛教。”“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佚和偶像崇拜，全都涤除于一旦。”^① 呤喇是带着赞赏的态度说这些话的，而另一位中国人则带着懊丧的心情慨叹太平天国的统治弄得儒、释、道“三教俱废”。^② 其实，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确实，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是曾经想用政权的力量把拜上帝教推行到民间的。《天朝田亩制度》就详细规定了“内外诸官及民”包括所有“男妇”及“童子”，都要从事读圣书、做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等活动。^③ 《醒世文》中也有“为民务宜守本分，逆天者亡顺天存。尔们亦是爷生养，务各认识圣父亲。天父上帝当虔敬，切勿私自拜邪神”的训诫。^④ 洪仁玕在1861年发布的《諄谕众民》文告中，强调凡“投诚天朝，仍为中国华民者”，都应“诚心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切不可拜一切人手所做之木石死妖该杀。”^⑤ 但是，象太平天国的其它许多政策规定一样，在宗教方面的这些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了的。

①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4、235页。

② 虞阳避难史汤氏辑：《歙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11页。

③ 《太平天国印书》，（上），第413页。

④ 《太平天国印书》，（下），第666页。

⑤ 《钦定军次实录》，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84页。

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后，曾在一些城市如武昌、天京、镇江、扬州等地，对全体居民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男馆”，全体妇女集中到“女馆”，在一个短时间里暂时取消了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许多材料表明，当太平天国用这样一种方式组织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时，他们确曾把拜上帝教的一整套宗教活动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馆”中的每一个成员，每天清晨都要祈祷；三餐饭前都要在“馆主”的带领下背诵赞美词；每七日要做礼拜，敬拜天父；有时还要对人们能否背诵经句进行不定期的考核。但是，由于那种对全体居民“以兵法相部勒”使之实行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没有任何一点借以存在的客观社会条件，因此，到1855年春，太平天国政权终于被迫宣布取消，使自己的社会政策后退到现实生活所许可的范围之内，重新承认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合法性。从这个时候起，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使所有城市居民都“敬拜天父上帝”的事也就随之而告终了。

也许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天京是一个例外。因为按照吟喇的描写，一直到1861年，天京城内和城外的居民，每天傍晚还仍要在天王府的锣声的召唤下一齐进行祈祷：“天王府头一道庭院中置大锣数面，每日祈祷，鸣锣为号。锣声挨户传送，直传到城中遥远的角落，再由城上的哨兵传到四郊。城内和城外乡村，人人屈膝祈祷。我经常站在古老的南京城上，夕阳的余辉在周围投下了奇异的阴影，下面发出了人民的喃喃祈祷声。”^①不过，我们对这一段牧歌式的描写，暂时还只能抱存疑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它只是一个孤证，而且还因为这位好心的英国朋友，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强烈热爱和同情，在自己的记载中，不时发出一些不甚客观的夸张之词。至于在天京以外的其它城市和乡村，则任何类似这样的材料

①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82页。

都根本看不到了。

那末，是不是在 1855 年以后，太平天国政权在群众面前已经完全收起了拜上帝教的宗教旗帜了呢？那也不是。改变只是在于，他们把用行政措施组织群众的宗教生活改为非强制性的宗教宣传。太平天国统治区的人们，在下面几种场合，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拜上帝教的宗教气氛：（一）太平天国的文告中，一般总是有许多宗教性的语句，从事拜上帝教的宣传；许多政治性的措施也往往要加上某些宗教的论证。沈梓的《避寇日记》说：“余从白雀寺走过，见长毛有告示，系南京伪天王规条，有十诫、十嘱、十除、十斩四十条。其说总以天主、耶稣为教主，盖教匪也。所谓嘱、诫、除、斩者，不可胜记，约略举以而言，则诫者，诫人犯教中之禁也。嘱者，劝人从其教也。除者，除去恶习，如乌烟、花酒、释道之类。斩者，斩违教者也。”“又有歌咒几句，叫人朔望礼拜，亦忘之矣。”^①这里记的是 1861 年浙江秀水的情形，却反映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一般情况。（二）当太平天国军政官员向群众“讲道理”时，也常常要进行“拜上帝”的说教和宣传。上引《避寇日记》描述太平军的一次“讲道理”的情景时说：“所讲说者，百姓皆要敬天，所以遭难者皆不敬天所致。”^②《贼情汇纂》也说：太平军每“讲道理”时，“贼目先敷衍邪教套话一番”，“贼目讲邪教禁令，谓之天情。”^③（三）太平天国印刷了许多宗教宣传品，向群众广为散发。据毛隆保《见闻杂记》记载，江西丰城群众到南昌向太平军“进贡”，“送礼者归，各得书数本”，其中有《天条书》、《天父下凡诏书》、天历、《幼学诗》等，内容很多是关于拜上帝教的。^④ 1861 年春，一个叫做缪维廉的牧师在天京

① 《丛编简辑》，第四册，第74页。

② 《丛编简辑》，第四册，第72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三），第267页。

④ 《丛编简辑》，第二册，第59页。

与太平军的一位年青战士谈话，双方进行了这样的问答：

问：“所有的官署内全都注意教导属下的文武人员么？”

答：“是的。天京里面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到了一定年龄的儿童，全都能背诵天父的赞美颂。”

问：“乡间的人民怎么样呢？”

答：“那些短发的人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教导，可是圣书是发给他们了，他们可以学习。”^①

以上材料表明，在后期，太平天国对“拜上帝”的宣传工作做得还是很认真的。但一般说来，只以劝诫、动员、教导和让人学习为限，并不见强制人们直接从事具体的拜上帝活动的记载。

在拜上帝会的宗教信念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内容：一是敬拜“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独一真神”皇上帝；另一是不拜皇上帝以外的一切“妖魔邪神”。从当时的某些人们一直到当代的少数太平天国史研究者，据此而把太平天国称作是“反对偶像崇拜”、“废除偶像崇拜”的运动，把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称作是“打破偶像主义者”，这自然是很不确切的，因为上述两方面内容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太平天国不过是要用新的偶像崇拜去替代旧的偶像崇拜而已。但我们也确实看到，在实际活动中，太平天国用于破坏旧的偶像崇拜的措施，要远远超过于建立新的偶像崇拜的努力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对于新的偶像崇拜，除了一个短时期之外，一般只停留在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上；而对旧的偶像崇拜的破除，却一直以军事的和政治的力量强制推行，而且其时间几乎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始终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把反对和破坏神佛（所谓“死妖”）的斗争放在与反对清朝统治阶级（所谓“活妖”）的斗争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地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70页。

位。如果回顾一下太平天国的早期斗争史，可以清楚看到在农民战争爆发之前，拜上帝会众反对“死妖”的斗争，正是随之而来的反对“活妖”斗争的先导。而当农民战争进行了三年之后，杨秀清在《太平救世歌》的序文中曾这样总结这一段历史：“故自金田首倡大义，万众欢腾，诛灭群妖，焚毁妖庙，扫净邪秽，尽返真醇。此数千年来未有若此巍巍之功德也。”^①这里所说的“诛灭群妖”，是指摧毁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统治；而“焚毁妖庙”，则是指对佛道寺观的破坏扫荡。在杨秀清看来，这两方面是可以相提并论的，都是亘古未有的巍巍大功业。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仍然把反对“拜邪魔，信邪说”，视作是天朝新于清朝之根本所在：“干王谕曰：倘我天朝之人，仍依妖之俗例拜邪魔，信邪说，叛皇天，恃己力，一切妖样而行，又何敢自称为新乎！”^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太平天国在所占领的城市和乡村，都雷厉风行地进行了破寺庙、毁神像的活动。这方面的材料甚多，下面我们按地区举一些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实行这一措施的普遍性和持久性。

湖南：“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湖北武昌：“然不信诸神及浮屠氏，遇寺观辄火之，目为妖庙。”（佚名：《武昌兵燹纪略》）

安徽：“贼勒焚神像，藏匿者有罪。”（储枝芙：《皖樵纪实》）

南京：“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姑就金陵言，城外则白云寺、灵谷寺、蒋侯庙、高座寺、天界寺、雨花台亭、长干塔、吕祖阁、天后宫、静海寺，城内则鹞峰寺、朝天宫、十庙等处，此犹其最著者，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数，间遇神像无不斫弃。”（佚名：《粤逆纪略》）

① 《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41页。

② 《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74页。

江苏镇江：“贼于神像无不毁坏。”“金山、北固山梵宇甘露寺俱付一炬，万岁楼为列朝胜迹，亦成焦土。”（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

江苏苏州：“及贼入城，庙宇寺院神像，莫不铲毁。”（潘锺瑞：《苏台麋鹿记》）“一切神佛庙宇，或毁或焚，无有存者。”（王步青：《见闻录》）

江苏常熟：“庵观寺院，若城中之致道观、致和观、慧日寺、方塔寺、白衣庵，及城外之破山寺、三峰寺、维摩寺、拂水寺、龙殿、小云栖寺、普福寺、普仁寺、资福寺、接待寺、新塔寺，毁坏甚多，间有存者，惟破屋数间而已。在各乡镇者亦有毁坏，然较之在城附郭，则大相悬殊矣。”（佚名：《避难纪略》）

江苏青浦：“遇有神像则必毁坏之。”（姚济：《小沧桑记》）

浙江绍兴：“贼最恶神佛，遇祠庙，必毁，否则以刀砍塑像，或以粪污涂之，目为土妖。”（王彝寿：《越难志》）

浙江慈溪：“见庙像辄焚毁。”（柯超：《辛壬琐记》）

浙江海宁：“毁拆观庙无算。”（冯氏：《花溪日记》）

浙江秀水：“又闻万寿山本觉寺被陡门长毛拆毁，将砖瓦营造土城炮台，而濮院翔云观、东嶽庙等亦被长毛拆毁。”（沈梓：《避寇日记》）

浙江乐清：“贼毁城内神祠殆甚，扑其像投之水火，乡村诸社庙虽未毁，然像设罕有完者。”（林大椿：《粤寇纪事诗》）

浙江温岭：“好纷纷改作，尽毁神庙，惟圣庙及朱子庙无损。”（叶蒸云：《辛壬寇记》）

江西南昌：“进外（按：进贤门外）如绳金塔寺、法华堂、圆觉堂、宿觉堂、百福寺、无寿寺、法云律堂、祇圆庵、珠林庵。惠外（按：惠民门外）如圆觉寺、观音庵、西方庵。德外（按：德胜门外）如天空寺、泰宝寺、龙光寺、龙河寺、悦仙堂、北兰寺、药师院。章外（按：章

江门外)如石哥寺等,类不可胜数,皆焚毁殆尽。”(邹树荣:《蒿青诗草》)

江西湖口:“乡下庙宇尽行拆毁,即著百姓搬运。”(张宿煌:《备志纪年》)

山东临清:“各庙神像皆毁,文庙大成殿焚,圣像及两庑木主无存者。松柏多数百年物,亦被焚枯死。各庙神像或剜目斫手足及首,无一全者。”(马振文:《粤匪陷临清纪略》)

这里我们只是列举了材料的一小部分,但已经可以看出,地域上由南到北,时间上自始至终,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破毁寺观神像的方针。张德坚所说太平军“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①杜文澜所说太平军“所过名城繁镇,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朱碧绀黄悉薪之,金身法相悉火之”,^②是完全真实的。太平天国的许多政策方针,前后常有变化,唯独于此事一以贯之,这自然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有材料说,太平天国不仅破坏寺观神像,而且还“见僧道即杀”,^③“伪示有逢僧尽杀之说”,^④这却是一种过甚其词的失实传闻。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太平天国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告示,也根本没有看到过滥杀僧道的具体史实。^⑤不过,太平天国政权确实明令禁止僧道诵经念佛,也禁止群众“奉佛敬神”。如《醵闻日记》即载:“不许僧道诵经拜忏,稍与争执,刀背乱砍。”^⑥《劫余灰录》则说:“贼禁人间僧道追荐,不许奉佛敬神,见则以香烛置之厕中。”^⑦禁

① 《贼情汇纂》卷十二,见《太平天国》,(三),第315页。

② 《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二,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第316页。

③ 海虞学约翁:《粤氛纪事诗》,见《丛编简辑》,第六册,第380页。

④ 鹤湖意生:《癸丑纪闻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95页。

⑤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也认为,“毁寺观诚有之,杀僧道则不尽然。”(见该书上册,第532页)这个看法是实事求是的。

⑥ 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11页。

⑦ 见《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62页。

令的范围,甚至包括不准“民间供奉家堂、灶神”,^①“不准以纸钱、饭菜追敬祖先。”^②看起来,这真是相当彻底的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把火可以很容易地把寺观庙宇烧个精光,一纸命令却很难将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教心理随意改变;毁坏泥塑木雕的神像是轻而易举的,要摧毁人们心目中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佛的地位却无法一蹴而就。太平天国禁止人们“奉佛敬神”的命令,遭到了群众默默的、然而却是顽强的抗拒。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显然是低估了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和力量。事实上,传统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了千百年的历史,在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南人信鬼神,固沿习俗”,“神佛塑像,吴人敬奉如生。”^③不但是一般没有文化的人们,就是在封建士大夫中,绝大部分人也满脑子是神仙鬼怪、因果报应的那一套。在太平军占领常熟的前夕,有人就描写了当地知识分子如何热衷于请神求仙的情景:“有读书子弟,始由扶乩请仙,联诗作对,继而妄请上界大圣大神,虔心邀福。乩判略示,疑逗天机,必倾心信感。后渐入魔道,诵经礼忏,制备庄严,练习礼仪,纠集五、六十人,礼忏设醮,居然锣鼓钟磬,步罡踏表,儒冠道服,不知成何体统!”^④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佛教思想已经是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思想。用简单的办法宣布这种思想是荒谬的和非法的,显然不能达到取缔这种思想的目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生活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人们,依然用极其虔敬的心情礼神拜佛。——当然,在通常的情况下,是

① 蔺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7页。

② 王元年:《紫微馆诗钞》,见《丛编简辑》,第六册,第394页。

③ 潘鍾瑞:《苏台麋鹿记》卷上,见《太平天国》,(五),第273页。

④ 柯悟迟:《漏网偶鱼集》,第32页。

稍为隐蔽地进行的；但也不乏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活动，只要条件允许这样做的话。

据《柳兆薰日记》的记载，当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了他的家乡吴江芦墟以后，他仍多次带领子侄至庙中敬神。如：

1860年10月22日：“饭后，衣冠至本庙观音大士前、刘王神前焚香虔叩。”

1861年3月12日：“饭后诵经毕，率应墀、应奎衣冠至广阳庵拈香烛，至文帝、武帝前叩头拜祝，默求保佑免劫。复至观音菩萨前叩头拈香，求三十签，下下。”

同年6月20日：“饭后，不具衣冠，穿夏长衫，具蔬果、香、酒、烛至庙（按：疑为“广”字之误）阳庵叩拜文帝、武帝。今日武帝圣诞。”

1862年3月3日：“朝上，拈香烛在大厅上陈设，恭拜文帝圣诞，武帝前亦谨奉一瓣香，同供拜叩。广阳庙有土毛窟，不洁净，故于家中悬拜。”^①

这几则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因为广阳庵中驻扎了太平军，所以只得悄悄地在“家中悬拜”了。

如果上述材料只是反映了日记作者的个人活动，那末，龚又村《自怡日记》中的记载则表明了群众祈神拜佛的普遍性：“（1862年9月15日），今夏祀火神，家家用纸钱，予家仅香烛，今特补礼，命子代叩神前。”^②

在相当一些地区，僧道依然十分活跃。他们到处代人唸佛诵经，设坛打醮，有时甚至忙得不可开交。前引《自怡日记》中就提到日记作者之兄亡故后，曾“遣羽士啐经镇宅。”^③《柳兆薰日记》中也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43、170、191、238页。

② 《丛编简辑》，第四册，第159页。

③ 《丛编简辑》，第四册，第383页。

提到自己的儿子病后，“请紫云庵僧代诵金刚经一千卷，祈求病体能愈。”^①虽然后来这一千卷金刚经并没有能挽救他儿子的生命。沈梓的《避寇日记》甚至讲到这样一个情况：1860年夏，太平军占领的秀水县濮院镇发生瘟疫，旧历十月“初九日，为先姊六七之期，拟邀僧礼佛，僧以镇人死者多，而佛事忙，弗能齐集而止。”^②和尚们的生意如此兴隆，这大概是坚决反对“拜一切邪神”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们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一些地方，人们还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有众多群众参加的敬神拜佛的宗教活动，如平时举办“佛会”，收获时敬神演剧，天旱时请佛祈雨等。佚名的《庚申避难日记》中，多次出现“城隍庙焰口，兴教寺亦焰口”、“余至陶家宅佛会家吃面”、“到元田里钱姓家为三官佛会，代伟儿烧香，缴社钱，吃面而回”等记载，这是常熟的情形。^③《柳兆薰日记》中有“村人敬神演剧，尚有升平景象”、“村人敬神，雅奏一日”的记载，这是吴江的情形。^④《癸丑纪闻录》中则有“因旱请佛祈雨”的记载，这是嘉善的情形。^⑤这些材料显然表明，至少在这些地区，这样一些活动是为太平天国政权所容许或者默认为的。

这类现象的频繁出现，看起来未免有点奇怪，但却并不是难以索解的。太平军将士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生活的那个社会条件的制约。不但是大部分新战士，就是对于一些两广的“老兄弟”来说，接受具有千百年传统的释道观念也远比接受陌生的拜上帝教教义容易和自然得多。这一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39页。

② 《丛编简辑》，第四册，第48页。

③ 《丛编简辑》，第四册，第511、538、549页。

④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35、143页。

⑤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525页。